

好消息传到中国



如下是阿姆斯特朗先生关于基督教世界宗教领袖首次官方访问共产主义中国首都的个人报告。

-- 撰稿人：赫伯特·W·阿姆斯特朗

再有三十五分钟，我将离开政府的“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我的听众包括七十六位大使及其夫人们，其他多国的政府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官员。昨晚，在北京烤鸭店我已经向大约四百人发表了演讲。听众中包括许多重要政府官员及夫人，还有来自不同大学的一些教育工作者。

这里的领导人领导着十亿的人口！同他们讲话就是在同当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对话！感觉棒极了。我昨晚的讲话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此刻是晚上九点三十分，我已经能够回到我们夫妇如住的国宾馆房间中。事实上，我们全部人员，包括施坦利·瑞德夫妇，机务组，报道和摄像师都被安排住在这里。我们回来的有点早，晚饭和宴会通常大概在晚上六点钟才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在我们回北京的“家”的路上所见的车辆也不多。今晚晚宴所在地，人民大会堂是一个雄伟、壮观的大型建筑。按照美国的标准，大会堂的会议室和房间都非常之大。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在此看到的一切都给人以广阔宽大之感。主路非常宽广，据我估计，建筑物离路面大概有七十五英尺的距离，主路和建筑物之间又隔有辅路。今晚宴会的大厅面积大概有半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华灯吊顶非常华丽。

出席今晚宴会的包括来自七十六个国家的大使。宴会同往常一样共包括十道主菜（我听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是准备的是八道主菜的晚宴）。这是我到中国后的第三次大餐，每次大餐都有十道大菜。今晚宴会上负责介绍我的人是日本国会的山下涂廓先生，他在国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听说了“神的国”到来的好消息—虽然是在这个严肃的无神论共产主义国家。我描述了我们时代的远景，但并未使用圣经的语言。

国家图书馆

今天早晨我们九点钟离开国宾馆参观国家图书馆。这次访问特别有趣。图书馆现在设置在一幢较老的大楼里。图书馆正在快速累积书目资源，以发挥其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效用。

我们看到并有幸亲自查阅了一些最古老的树木。其中一部古代的书卷展开是一部长卷，全部由手工制作而成于公元前四世纪。其他有些书大概创作与四百年前。我还获赠得到一本精美的彩色图片集，包括许多放映当今中国面貌的照片。

离开国家图书馆，我们乘专车前往“紫禁城”，一个四面围墙的城中之城，也是古代帝王居住之所。这座“内城”之中又建有许多楼阁、庭院和花园，全部是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体现，各种各样的石雕也错落其中。

上周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机场时，迎宾轿车已经在飞机下等候我们到来，直接送我们到在城区下榻的国宾馆。

我马上就注意到到处都是人群。到达北京三天后，我发现成千上万的行人充斥着北京的大街小巷，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开始的时候看到的车辆并不多，但是进入城市中心区之后，车流变得跟在美国一样多，同时还伴有大量的自行车，路边更有数不清的行人。

在北京，比较现代的建筑空间都比较广阔。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到广阔宽大之感。当然，北京是一个大概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从人口规模上同纽约和伦敦不相上下，但是气氛是完全不同，这里带着明显的“中国气息”！

上述都是在北京期间的随笔记录，看在眼里落在笔端，因此显得有些零散，但是因为现场的感受记录，所以在此并不再做修改。

我们现在在东京。周六将会举行大型宴会，参加人员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及夫人，其他国家的大使夫人，中国使馆人员也将出席宴会。

现在我将按照时间顺序重述此次中国之行。但是我必须首先指出的是，本次中国之行恐怕是我迄今为止最为重要也最为成功的一次出访。

访问中国之始

在夏威夷檀香山休息停留两天之后，我们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晚上抵达东京。十二月二日星期天从东京飞往北京。到那的时候，正像我上文中提到过那样，政府派的专车已经直接开到了我们飞机之下候机。我们没有按照通常的要求那样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上车时，我们将护照交给工作人员，入境第四天我们收到了手续办理停当的护照。

我们被开车送往政府国宾馆。当天晚上，北京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准备了一个小型餐会—包括十道主菜。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宴会。第一道菜上来的时候我几乎就吃饱了—却不知道后面还有几道菜等着我。他们想我，想瑞德先生，我们的夫人和其他人员多次敬酒。我被告知可以以水代酒来感谢主任的好客之情。

十二月三日周一晚举行了规模最盛大的一次宴会。出席人员大概有四百位，其中主要是政府和大学的官员及其夫人们。坐在我左边的利比亚大使致开场词。瑞德先生应邀作了简短发言。之后日本国会高级议员山口先生介绍了我。山口先生的女儿曾经在加州帕萨迪纳市大使大学就读过一年—他本人也是“日本之子”的重要成员之一。所有对话都通过翻译转达。顺便提一下，翻译本人是一位大学的英文教授。

我随他上台。我的讲话都被录音并在当晚转播给帕萨迪纳市大使大学。所以很多人在美国也听到了我的讲话。

当然，翻译的存在就意味着有两个麦克风，发言人每说一两句话就需要停下来等翻译将它翻译成中文。

但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国家，我并没有运用圣经的语言。我向他们转达了神的国的福音，宣告了即将由神统一主导的世界的到来。我没有用“主”这个可能引起他们反感的词，相反，我用的表达方式是将会干预局势并且引导世界走向和平的“未知的无形的有力的手”

他们对于这一信息能够很好的接受。我听到有人说我的发言“启迪他们思考”。

星期二我们一早出发前往中国的长城—就人类创造的奇迹来说长城真不愧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全长三千六百公里，宽度足有两个车道高速路那么宽。

星期二晚上除了中国的官员和夫人们，代表七十六个国家的大使和夫人们也参加了大型晚宴。也就是这次宴会所在的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面积足有美国橄榄球场那么大。多数在场人员都能听懂英文，因此我的话并不需要翻译。我再次告诉他们“神的国即将到来”的好消息—只是表达的方式

更直白。当然在场的人也很好接受了我的讲话。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晚我是在向七十六个国家的官员们讲话。过去十年来很多宴会让我有机会同许多国家的官员代表有过沟通。几年前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次午餐会上同时在座的有十九个不同国家的大使。

当预言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马修 24：14）的时候，它并不完全指的是传达到所有国家。十二月四日神的国即将到来的福音被传达给来自七十六个国家的官员代表时，预言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实现了！这些国家有的来自非洲，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亚洲，还有来自南美洲——基本上涵盖了世界各个地方！

当天晚上的发言我在此不作重述，因为成千上万的读者可能在看到本文之前已经听到了录音的版本。

但是我必须指明的是，我是世界和平的大使——同许多的政府首脑沟通——首脑们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某个人可以解决的——而同时，我也在尽力去协助在现有的国家间实现更加和平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个问题并非人力所能解决，而“未知的无形的有力的手”（他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将会进行干预，带给我们真正的世界和平和最终的救赎！

关于中国的长城，我再插一句。它的长度比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到纽约的距离，也就是横穿整个美国的距离还要长。虽然我见过它的图片，我当时并没有意思到它是沿着山脉的蜿蜒曲折而建。而且长城完全是人工建造——可能是无数人的辛劳。整个建造过程也持续了上百年。而建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十二月五日星期三，如同之前提到的一样，日程异常紧张。九点钟我们出发去国家图书馆。之后参观紫禁城，城中之城，也是之前帝王的宫殿和住所。参观完之后用了午餐。所有到场的人坐满了三个圆桌。

当天下午四点，是整个访问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我们被开车送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途中经过三面的三个不同的宏伟的入口，最后在第四个入口处进入。

同谭震林副主席会面

通过宽广的入口进入到大厅中，迎面走来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谭震林先生的为首的代表团，谭先生也是共产主义中国三位最高层领导人之一。华主席（华国峰）和邓副主席（邓小平）当时正在机场，迎接即将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访问的日本首相 MASAYOSHI OHIRA 先生，鉴于此时朝鲜和越南的局势，此次会议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实际上，我被安排同谭副主席私人会面是很好的安排。之所以这么说，我需要首先介绍一下谭先生。他七十七岁高龄，是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代的人。在推翻蒋介石政府的革命战争中，谭先生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关系密切。他是坚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事实上，我们发现他同毛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重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当今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意义非凡。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无间，这种友谊持续了将近五十年。虽然有其他革命者企图破坏这种长久的关系，但是多年来他们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

为了更好的阐述我同谭主席会面的重要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毛主席是整个革命的决策者和缔造者。同时，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定者。他是中国共产主义（有别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主要哲学家。

周恩来实际上比毛泽东更早参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当时他是在欧洲留学的学生。他所接受的教育比毛泽东更加学术化。他在日本、法国和中国都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而毛泽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一个有趣的小杂闻就是毛泽东主席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图书管理员。也正是在此，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其他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有了接触。此后之于到 1949 年共产主义最终胜利，毛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周恩来也参加了军事行动。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毛和周都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他们同时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着手政治管理。

1949 年共产主义胜利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担任政府总理。毛确定所有的政策方针直到其去世。周建立行政体系来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毛同时任命周负责国家的对外事务。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周恩来广泛出访，中国逐渐从沉睡的“灰暗时期”中崛起并逐渐

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他们之间的关系超乎寻常，这种关系也让中国人对两人同样的尊重和崇敬。毛去世后，建立了一个大型纪念堂。他的遗体正式的躺在纪念堂中，遗体保存方式跟尼古拉·列宁采用同样的方式。而周恩来遗愿要求将遗体火花，骨灰遍撒中国。因此并没有周恩来的纪念堂。但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石碑的一侧仍然篆刻着周恩来的手迹。

当时现在，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都不及年长的邓副主席同两位关系长久和亲密。

明白了这一细微的背景，你就能更好的理解我从谭副主席那里获得的信息有多重要。

我所说的消息

我来到共产主义中国，并不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我曾经写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其无神论和无主论。但是我认为我现在比当时更加明白，所有的国家，除了那些起源古以色列的，同主的联系自从亚当夏娃时期开始，都已随主的心愿业已被切断。

耶稣·基督在说到“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约翰 6：44）时就强调了这点。其他国家对于我主的了解并不很多。在古埃及，他们膜拜自己假想的神灵。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同一时期，古代中国人也在膜拜自己的祖先——甚至早在儒教和道教的出现之前就有这样的传统。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崇拜的神灵，比如朱庇特、黛安娜、荷马及其他。

他们没有救赎——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迷失”——主自己切断了同亚当后代的联系。他们根本不会受主“评判”——直到今天仍然不会。既然主都不去评判他们，那么我和你为什么去评判他们呢？我知道我自己此刻正在被评判——以及主已经派遣的人此刻也正在被评判！这就是我们每年最初的果实日，也就是“圣灵降临节”设置的意义所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得到主的感召。但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还并没有！那些现在被吸引到主的教堂的——既是最初的果实——只是精神救赎的第一小部分收获。对于所有其他人，主事实上说到。“走，既然你（亚当）已抛弃我，我的管理，我的救赎和我的知识。走，去形成你自己的神主，形成你自己的宗教——你自己的政府——你自己的知识和教育基础。”

而且，在将近六千年中，世界也正是这样运转的！所以，我拜访当今世界的各个政府首脑，并非去评判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宗教或者他们的教育体系。我并非去试图让他们“改信我主”——也并非试图去让他们认同主的真相和接受神的国已经到来的好消息，我只是向他们强调这种理念，很快即将成为现实。

我仅仅告诉他们我到此是为了通知即将统治世界的神的国的到来，神的国带给他们以及全人类的是和平、快乐以及终极的救赎！

这就是我主基督赋予他的使徒的神圣使命，基督信任的使徒负责将这个好消息传递！这也就是我用他们不反感的语言传达我主耶稣·基督信息的原因所在，而他们也完全理解！

而这也就是我同谭副主席讨论的基调和出发点。

在我重述我们会面谈话之前，了解这些介绍信息非常重要。

谭副主席向西方传达的信息

当然，在会面前谭副主席一定已经详细了解了我的背景情况，包括我上面提到的基调以及我前两天晚上发表的言论。而且他也知道《真相》是一本以五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刊物。所以他告诉我的话明显是想向我们的读者传达的。

谭震林副主席并不是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秘书引我们进去。他亲自来到大厅入口迎接我以及我的随行人员——瑞德先生和后藤至正先生。他性格外向，态度昂扬，是一位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的绅士，跟想象中的表情严肃、眉头紧锁、神态傲慢、沉默忧郁的形象一点不象。他步履轻快，非常热情的迎接了我们，并且用双手同我握手。

我们随他进入临近的一个大房间。他请我就桌子坐下，随行人员依次坐开。之后，然后他拿了把椅子面对着我在我旁边坐下，也刚好面对着我后面的各位随访人员。翻译坐在我跟他之间的桌子后面。这位翻译曾经在机场接我们下飞机，我们之后的行程都有她相伴。她在翻译的同时，用某种

中文简写符号记下听到的每个词语。

落座后，副主席先生马上开始阔阔而谈，他大概连续说了半个小时。我只是没有听懂翻译的话需要她重复时偶尔打断他。

了解到我是一所大学的创始人和现任校长，他首先提到（当然不是道歉口吻）他本人并不是一名学者，之后他就全面谈论了世界地缘政治。

说到越南，他马上提到“多米诺理论”。在美国越南战争早期，多米诺理论在华盛顿甚为盛行——我当时也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北越南打败南越南，那么越南只是多米诺骨牌长链中倒下的第一道牌。紧接着就是柬埔寨、老挝，然后是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我们当时以为当时北越南的背后是共产主义中国在支持。但是谭副主席说其实越南的背后是苏联。他说到的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就是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由此开始并统治全世界是苏联的雄心，而并不是中国的目标。他实际是在告诉我美国应该反对的是苏联，而应该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作为美国在南越军事干预的考虑之一，“多米诺理论”事实上像我（作为一直默默观察事态变化的当事人之一）提到的一样确实不假。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不接受这一理论，苏联更是坚决抵制，在越战后期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反对之声。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通过表达中国的这一观点，中国就不需要对正发生在柬埔寨的恐怖的饥荒承担任何的道义和责任。

根据副主席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米诺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本来我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担心的是一旦共产主义中国在越南北部取得胜利，那么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向西方和南方倒下。但是现在反而是中国站出来说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不制止北越南的事态发展，那么北越南将是个巨大的威胁。柬埔寨将倒向北越南，之后是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所控制的重要海上通道。

副主席指出俄国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其实是类似于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三十年来通过不同的代理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他指出北越南不过是帝国主义俄国的又一个作战工作而已。

这段话让我想起越南总理阮哲明先生在越南被共产党控制被迫出逃之前不久说过的一段话。

如果我对谭副主席上述的谈话理解有任何失误的地方，那我很抱歉，但是瑞德先生同我的理解不出左右。我问谭副主席我是否可以从翻译的手稿那获得一份打印的谈话文稿时，他笑着摇了摇头。所以我跟他说我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记忆来记录和报道。

这时，谭主席转而谈到西欧的地缘政治，简单提到了伊朗危机以及中东问题。他敦促建立强大的欧洲以抵制帝国主义俄国。

我并不想打断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些话想跟他说。但是我憋住了，直到听他把话讲完。

解释世界大事的未来流程

又过了一会，他停下来，抱歉说自己讲的时间太长了，都没给我机会说话。于是我开始说：

“副主席先生，我想同您说说西欧对于苏联防卫的问题。虽然我说的您并不一定相信，但是我还是想要告诉您。以后真的发生了，您再相信它也不迟。再过几年，西欧将建立十个国家或者几组国家组成的联盟——而且可能会包括两或三个苏联卫星国家——从宗教和政府方面联合——主要通过罗马天主教实现。虽然我并不是支持者，但是短期内将形成世界的一极，具备同苏联和美国想匹敌的军力力量。他们将使用统一货币，建立统一政府和听从共同调遣的军队。这些将从当前的共同市场中产生，并将震惊全世界。”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表示并不相信。

我继续说道：“但是到最后，在上面的情况之后，出现的是许多世界知名科学家提到的拯救世界唯一的希望——虽然他们也觉得不太可能。我们的时代最终将见证，一个庞大的单一的世界力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所有国家——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对它构成威胁。”

我同世界很多政府的首脑交谈过。他们都面临的问题、困境和罪恶都不是某个个人或者某些人可以解决的——虽然很多或者多数政府首脑都是实力派人物。他们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作为世界和平大使，我也尽自己的努力提供帮助。但是最终需要的，借用一位美国编辑的话说，是一种无形的

“未知的强大的手”来实现统治世界的神的国。

他明白我的意思。他的脸上仍然堆满笑容，他继续摇头。

“我并期待您现在就相信这一观点，但是它最终会实现，”我最后说到，“同时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奋斗，同您一起协作，尽可能的提供帮助。”

同副主席会面一个小时，我们站起来道别。他送我们出来到外面的大门，一路同我们握手。他让人倍感温暖的热情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他表示希望我能够再次到访。

回到东京后，瑞德先生写给我一份备忘，提到“周一晚上和周二晚上副主席先生都听到了您的一再强调的思想，我想他一定知道统一欧洲和政治大变动同您所提到的将人类从彻底毁灭中拯救的未知的强大干预力量直接相关。”

谭副主席同毛主席和周总理长期的亲密关系以及他本人仍然是中国政府前最顶层的三位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使得这次会面异常重要—因为这三个人统治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会谈之后，我们回到国宾馆吃了点东西之后参加了由大使国际文化基金会赞助的半芭蕾舞表演。当我们走进剧场时，场内响起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被引导上台，同所有演职人员握手，并向鼓掌的观众鞠躬致谢。

周四中午我们开国宾馆赶往机场。在机场送行的也是几位高层官员。

一月八日星期六晚上，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东京也举办了晚宴。几位中国使馆的官员到场，其他国家的三四位大使包括山下先生和几位日本官员也出席了晚宴。星期天是漫长的返回图森艾瑞兹的航班，中途只在阿拉斯加的冷湾停留补给燃料。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育协会主席在国宾馆会见赫伯特·W·阿姆斯特朗



赫伯特·W·阿姆斯特朗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先生探讨未来世界局势

我必须指明的是，我是世界和平的大使—我同多过的政府首脑探讨过—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个人可以解决的。

我们的时代，终将见证，一个单一的世界力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统治所有国家—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可以对它构成威胁。